

“自愿参加”变“必须参加”,“半天时间”变“一个小时”

一培训机构为领补贴强迫农民工看录像

南京市人社局获知后,对该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整顿,并称严把培训补贴申领关口

本报讯(通讯员端木伟涛 记者杨召奎)日前,多位在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求职的农民工向记者反映,他们在上岗前,必须得去市场里的培训机构看一个小时的劳动维权方面的录像,否则就不给办理就业证。这是为何?《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原来培训农民工可以申请政府补贴。

“这边老板等着我去上班,那边市场却要我先去看一个小时录像,这不耽误事吗?”8月8日,老家安徽安庆的曾克贵在安德门民工市场求职时,被要求在上岗前必须去市场

南侧的培训教室看录像,否则不予办理就业证,而如果没有就业证,用人单位就不能录用他。除了曾克贵以外,最近在此求职的多位农民工都遇到了类似情况。

记者找到了这间门口竖着“政府免费培

训”牌子的培训机构,其门口右边还有一间蓝色的活动房。记者发现,每个农民工过来都需要填写培训报名表,培训项目有融入南京、家政服务、护工等八项,绝大多数都是去上岗的农民工都被要求在“融入南京”一项里打勾。

8月8日下午,记者与南京市职业技术培训指导中心王建杰主任取得了联系。他介绍,在安德门民工市场确实有政府免费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培训农民工,经过核查后,将按照每人5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培训为半天时间,需有专业的老师授课,而且农民工是自愿参加”。

既然是自愿参加,为何不参加就不发就

业证?多位农民工告诉记者,民工市场和培

训机构是合作关系,如果不拿就业证“卡”着,他

们一般不会去。随后,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南

京市人社局。8月12日,记者获悉,南京市人社局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对不规范的培训行为进行了整顿,接下来将聘请专职培训教师为有需要的农民工进行正规的岗前培训,并严把培训补贴申领关口。

有专家表示,岗前培训对农民工来说很有必要,但要防止培训机构重补贴轻实

效的问题,需从培训主体准入、培训数量上

报核实、培训质量回访等方面建立一整套

制度,并完善农民工培训资金管理、使用和监

督机制。

农家乐生意火 打工者乐返乡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出门打工不如在家开农家乐。”在呼和浩特市北郊经营一家农家乐的刘芳说。随着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从城市返回农村,经营起农家乐来。

呼和浩特市北郊的大青山劈柴沟,由于紧邻京包高速公路,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吸引了不少呼和浩特市民前来游玩,短短几年,在这里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已经达到几十家。

据刘芳介绍,3年前,她和丈夫辞了呼和浩特市区的工作,回来开起了农家乐,提供吃住玩一条龙服务。这几年,生意一年好过一年,“收入是打工的几倍,时间还能自己支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里经营农家乐的农户都是当地人,其中有一些年轻人,自称在城市打工没有归属感,所以回到农村,开办农家乐赚钱。随着这些年青人的回归,农家乐已经不仅仅是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还渐渐有了摘农家菜、劈柴生火、学做农家菜等新的项目。



执行法官15分钟锁定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并迅速完成了冻结

福建长汀:“互联网+”执行助163名农民工追回欠薪

院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法人吴某在接到法院强制执行通知书后,仍拒绝支付,并藏匿了起来。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通过全国身份信息查询平台及全国组织机构代码查询平台,对吴某和福建某纺织公司的身份信息及工商登记信息进行查询,并在第一时间在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

的财产状况进行查询。经过查询,执行法官仅用了15分钟便锁定了被执行人在银行的2笔存款共23万余元,并迅速完成了冻结。

“除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信息,还可查到其房产、车辆、证券等各种财产信息。我们足不出户,就能迅速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摸得清清楚楚,这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说到执行查控系统,该院执行局局长王敬生高兴地说道,“如今,多则半小时,少则一两分钟,便可通过银行自动查询并冻结被执行人存款。”

随后,长汀法院还查封了被执行人的房产、土地、原材料及机器设备。因房产、土地已办理抵押贷款,为及时解决张某等人的欠薪问题,执行法官从公司目前尚有的原材料和陈旧的机器设备入手处理,联合开发区管委会

对公司的原材料、设备进行清点,并进行评估、拍卖。今年1月12日和1月22日,长汀法院将被执行人所有的机器设备及原材料分成五大类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最终,一家外省企业通过网络竞价,以16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被执行人的原材料,另有一名私营主以50余万元买下了机器设备。

“快开学了,孩子又要‘飞’走了”

——几个京城外来工家庭的暑假相聚时光

本报记者 曲欣悦 赵航

暑假期间,在北京鼓楼外大街的日月晶盛菜市场,孩子们的身影较之平日多了不少。目前,他们和居住在这里的普通孩子一样,享受着难得的暑期长假。但不同的是,过了8月,他们便会像“小候鸟”一样飞回自己的故乡上学。身份也随即转变为大家熟悉的那个名词——“留守儿童”。

“小候鸟”的父母们也有着相似的背景,外来务工一年回乡一两次,大多来自长江以北的北京周边省份,靠批发蔬菜水果、摆食品小摊谋生。

暑假,也成了这些一年到头奔波在外的父母与自己孩子难得可贵的相处时光。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把“坚持家庭尽责”摆在了基本原则的第一位,强调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这标志着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开始进入法制的轨道。

今年6月底,2016年度《中国留守儿童

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自尊以及心灵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年与父母都没有见面,以及一年与父母没有联系或者只联系一两次的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留守儿童。

父母的陪伴作用和监护地位难以取代。

然而,对于“小候鸟”的家长们来说,放孩子“飞”回老家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老家:
入学更容易,父母称“省心”

李成强2006年就从河北邯郸来到北京,一直在日月晶盛菜市场摆摊卖葱、姜、蒜,一晃就是10年。他的儿子今年7岁,刚在老家邯郸山区完小学一年级。平日里,妻子朱丽负责在河北老家照顾孩子,到了暑假便和儿子一起来到北京,既是来帮忙也是图团聚。

其实,儿子读小学之前一直都在他们身边。“在这附近上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朱丽说。但是,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上小学这道坎儿很难迈过去。据《中国青年报》一

面向20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办理流程繁琐,证明要求多。北京市规定,非京籍儿童入学必须办齐“五证”,包括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

“我们的房东人不错,租房证明之类的都给我们办下来了。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朱丽说的“问题”,是指入学要求中提到的父母工作证明文件,包括父母双方劳动合同、社保权益记录、在职证明等。这对于在京既没有工作单位、又没有上社保的朱丽一家来说非常困难。于是,去年起,朱丽开始随儿子回家陪读。三口之家,变成两地分居。

李成强夫妻摊位对面卖水果的邯郸老乡吴佳华,则根本不考虑让孩子到北京上学这件事,“我只知道要办很多证,得花不少钱。”

吴佳华的儿子今年9岁,她觉得比起千辛万苦把孩子弄到北京,“留在老家更省心”。

卖西红柿的保定人赵玲,一家五口包括老伴儿、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北京,刚满5岁的孙女由她和老伴儿带。为了让孙女做好明年回乡上小学的心理准备,夫妻俩现在就开始给孙女打“预防针”。但每次一说起这事,孙女都会嚷着,“我不上学,我不上一年级。”

去年,赵玲也曾看到过往处附近墙上贴着的宣传外来务工子女如何在京就学的告示,但密密麻麻的各种条件,让老两口犯愁了。“我也想过让她在这儿上,可是那么多证,办不来啊。你自己办不了还得托人,多麻烦啊。”因此,即便孙女不愿意,老两口都认为上学还是回老家的好。

城里:
住不理想,无暇顾孩子

一早6点不到,魏霞和丈夫的烧饼店就开了起来,周边上班族很多,店门口排起四

五人的队伍是常有的事。夫妻俩忙起生意来,小女儿就只能自己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玩纸箱子,“宝贝儿,小心台阶!”一位来买早餐的大婶看见小姑娘已经坐到了高高的台阶边缘处,提醒了一句。正在摊煎饼的魏霞赶紧探出头,望一眼自己闺女,见没事便立刻继续忙手里的活儿。

魏霞一家来自山西运城。她和丈夫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14岁,刚中考完,小女儿才满3岁,已经上了几个月的幼儿园。

“其实真不想带她过来,来了也是让她受罪。”魏霞租住在西城区小石桥胡同的地下室,一家四口挤在10平方米的房间里,天气热却没空调,夫妻俩白天忙生意,根本没空照顾孩子的饮食。去年夏天,女儿在北京住了十几天,因为吃的不干净得了手足口病,“回家打了一周的针”,说起这事,魏霞的眼里还闪着泪光。

去年,赵玲老夫妻俩刚带着5岁的孙女租住进了五道营附近的小平房里。在此之前,他们在北京住了10年的地下室。“住上了平房,就再也不想回地下室去住了。”吴佳华和丈夫就租住在每天批发水果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住的地方很小。在老家,孩子住得也能宽敞点。”

为了能多赚钱,魏霞和丈夫的烧饼店从知春里辗转到了东二环,生意好的时候,也会让他们产生孩子接过来、换个好点房子的期待。但大多数时候,并不遂人愿。“现在钱不好赚,你别看这个店面不大,月租5000多元,刚开始几个月我们都赔钱。”提起以后是否还想让孩子到北京上学,魏霞摇摇头,“我自己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道回府了。”

求解:
关爱有缺失,如何能弥补?

暑假,北京城里各大景点挤满了亲子游的家长孩子。魏霞的孩子们来了快一个月,

夫妻俩只抽出了一天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北

海公园逛逛。李成强和朱丽则还没空带孩子去看看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夫妻俩一大早就得出来赶早市,只能把6岁的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留一点早饭,到中午才能回去看看。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他们正准备过两天就先把孩子送回外婆家照顾。

其实,从老家邯郸到北京,坐动车只需要两个小时,但李成强忙起来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家看儿子。“少干一天,就少赚两三百元”,朱丽对丈夫的辛苦表示理解。父子平日的联系主要靠电话,“他打来的不多,有时候还得靠我张罗着才行”,朱丽带着一丝嗔怪的口吻说。

与年纪尚小的女儿不同,魏霞夫妇与即将上高中的大儿子分隔时间更长。儿子渐渐长大,魏霞明显能感受到他与自己的疏离感与日俱增,“儿子不怎么来店里,平常和我们打电话也聊不了几句。”但是,在魏霞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儿子很黏他们。有一次夫妻俩临走前,儿子硬是拽着他们的行李箱不让他们走,“运城也可以赚钱,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来?”儿子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魏霞记忆犹新。

如何让“小候鸟”不再孤独?如何让他们的父母在扛起谋生重担之余,不用再承受无法陪伴儿女的内疚?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傅莹表示,如何保障和保护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痛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家庭。”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源头上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团聚,除了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加强父母的履约意识、监督父母的履约行为之外,还要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也可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再过一年,50岁的赵玲将独自带着孙女回河北上小学;再过半个多月,朱丽就要丢下丈夫和摊位上忙不完的活,随儿子回家读书……就在一个月前,魏霞刚把孩子们接来北京那会儿,她的朋友圈里分享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最大的成功,是有时间陪孩子》。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使用化名)

【一周大事】

农民工修路受工伤 假律师领走赔偿款

据《成都商报》8月15日报道,52岁的农民工老杨在修路时不慎遭遇塌方,丢了左腿。为了维权,他通过亲戚委托了四川法从律师事务所的周贤斌“律师”帮助自己。官司是赢了,可赔偿款却迟迟没能到位,过了许久,老杨才发现,为自己维权的“律师”周贤斌根本不是律师,他领走了部分赔偿款,将49万元揣进了自己腰包。

[点评]农民工维权本来就很困难,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还被假律师将赔偿款骗走了,老杨的遭遇让人心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所证明材料。既然周贤斌没有律师证,为何能够代理相关案件呢?从报道来看,周贤斌只是律所的助理人员,他从律所内勤处领了空白公函自己填写了名字,而仲裁庭只看有没有公函、授权委托书,并没有审查律师证。这件事提醒我们,律所应规范内部文件管理,仲裁庭和法院要依法严格审查代理人证件,农民工维权时也要“多个心眼”。

“网约工”第一案开庭 有无劳动关系成焦点

据《人民法院报》8月15日报道,“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使得APP服务业务日渐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新问题新情况。8月9日上午9时,“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7名私家厨师坐在原告席,起诉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和上海乐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索赔。

[点评]在现实中,一些APP平台觉得自己和劳动者是一种商务合作的关系,双方签订的也是一种“合作协议”,因此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也不按《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权益,这引发了一系列劳动纠纷。由于“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有着很大不同,目前国家在法律监管上尚属空白,也让一些企业钻了空子,规避了自身责任。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的劳动监管。

人社部明确:跨省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可获交通补贴

据《京华时报》8月12日报道,人社部发布了《关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工作的意见》,明确输出地要对跨省务工的贫困劳动力给予交通补贴。对于那些在城市打工又转岗、失业或返乡的贫困劳动力,人社部要求,输入地与输出地要为其及时提供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点评]贫困人口外出打工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个特点。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仍有超过7000万贫困人口,而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劳务输出大省。人社部此次发布的意见一方面要求对跨省务工的贫困劳动力给予交通补贴,另一方面要求输入地要动员企业参与,积极组织技能培训,实现岗位对接,帮助其稳定就业。可以说,体现了政府对农村贫困劳动力的关怀和帮助,既有利于鼓励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又有利

于他们顺利和稳定就业。

据《济南日报》8月15日报道,前几日,不少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在网上抗议,呼吁校方禁止附近医院病员进入食堂就餐。对此,该校红园餐厅门口张贴通知,该食堂将全面杜绝外来人员就餐。但此规定一出,又引发了部分学生抗议的声音:“病号不能进入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可是为学校出力的农民工也不能在学校吃饭了,谁能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

[点评]平心而论,有些病员进入餐厅使用公用餐具,确实会给师生带来潜在的健康隐患,餐厅对此管理也是情理之中。但该高校简单地用一纸禁令就将所有外来人员拒之食堂门外,尤其是包括了尚在校内进行建设、吃饭多有不便的农民工,此举似有不妥,我们期待该校能够充分听取学生意见,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饮食需要,对外来人员就餐作出更加合理的安排。(点评 杨召勤)



暑假的菜市场里,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和家长一起出摊卖菜的孩子。

曲欣悦 摄